

□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光阴流转,昔日红墙绿瓦的明代王府,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其遗存却成为青州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有邻衡王府——衡王府历史文化展”是青州博物馆新馆五大常设专题展中唯一全新策划的展览。作为“第二十二届(202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一部分,这个展览为地方博物馆深挖地域特色、讲好本土故事,带来许多积极尝试。

藩屏在青州

西周以来,历代统治者对同姓宗亲大行分封,希望以血缘关系构筑帝国屏障,此谓藩屏。朱元璋建明后,稽古改制,广封诸子为王,镇守要塞,形成拱卫帝室的藩屏,欲以“亲亲之道”辅弼江山永固安宁。

朱元璋确立每个亲王后,都会赐予20个字。每一代的男性成员,取一字作为名字的第一个字,也就是字辈;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则由五行确定,顺序是木、火、土、金、水,依次循环。比如朱棣、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朱见深。

明代累计分封亲王266位,亲王之下,又有郡王、将军、中尉等层级,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石的宗藩体系。为有效管理宗室群体,朱元璋诏令中书省编修《祖训录》,开设大宗正院,制定严密的宗藩制度。

明代宗室分封有两个显著特点:世袭罔替和降等袭爵并存,设有保底爵位;王爵的继承讲究嫡庶之分,仅嫡长子具有世袭权,其余子嗣只能降袭。当然,这种分封模式只是一种理想化结构。从皇帝到郡王,都存在次嫡子、庶子、甚至旁支子孙继位的情形。

青州作为海岱重镇,先后有齐王朱棣、汉王朱高煦、衡王朱祐樾受封。不过,齐王、汉王因谋反被诛,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衡王一脉,存续了近一个半世纪。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宪宗朱见深封其七子朱祐樾为衡王。弘治十二年(1499年),朱祐樾就藩青州,至清顺治三年(1646年),末代衡王朱由楨被清廷处死,衡王共传六世七王。衡王之子有些还被封为郡王,共有玉田王、新乐王、高唐王等29人。

清初,王府两次被查封,衡王家族崩离析。就连王府建筑也被拆除,部分材料被挪走,用于建造山东巡抚院署大堂和法庆寺,王府原址仅剩两座石坊。不过,衡王府在青州留下了深刻印迹,其名、其址、其故事,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从宗藩制度最初构建思路来看,朱元璋想让能征善战的诸子领军,牢牢守住抵御北方和西部防线,由此构成长城、黄河、长江几道屏障。所以,明初藩王不仅有自己的封地,还能领军,是事实上的军政大员。

不过,历史的教训早已证明,势力渐大的宗室,往往会成为威胁君权的隐患,统治者总会转而推行强干弱枝的削藩策略。靠藩王班底起家“靖难”的朱棣成为皇帝后,深谙其中的利害,上台后剥夺了藩王的军事权力。但为了赢得支持,他继续按照朱元璋留下的祖训,给予藩王丰厚供奉。

无忧无虑的生活背后,是形同囚徒的严密看守。宗室子弟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这一禁令直到明代晚期才解除。宗室子弟过高的生育率,使得明朝政府不得不背负沉重的供养负担,为世人所诟病。

所以,自永乐朝起,藩王和宗室很少被提及,外界通常将他们视作无知、无耻、贪得无厌的王朝蛀虫。正因如此,讲述王府故事,很容易陷入两种窠臼:聚焦王权奢华与宫廷秘史,脱离群众史观;仅作为历史片段陈列,缺乏情感连接。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盛夏时节,各地书展如期而至,没有喧哗的叫卖,不追逐瞬时的流量,一场又一场引人入胜的阅读嘉年华,吸引数以万计的读者共赴这一年的文化盛会。南国书香节为期五天,许多名家活动在开场前就座无虚席。上海书展周末观展日门票早售罄,一大早等待入场的队伍长得看不见尽头,鲁迅同款毛背心更是卖到

断货的狂欢为何能点燃大众热情?提供交流场。一场书展,不仅是人与书的相遇,还是人与人的相遇。南国书香节汇集了格非、梁晓声、戴建业、康震等200余位海内外名家;上海书展马伯庸新书分享会开始前,800个号码牌早已发完。知名作家的到来,不仅为书展带来了人气,更提升了思想对话的深度和影响力。与单向接收文本相比,读者更渴望与作者面对面交流。见面会一座难求,签售会排起长龙,都折射出人们对精神偶像的情感认同和对深度内容的热切追寻。

强化特色性。不同城市赋予书展独特的气质,它们成为城市文化脉搏的真实跳动。江苏书展以《姑苏繁华图》长卷为蓝本,串联起近60位苏州文学代表人物;兰州书展打造了丝路文化市集、黄河文化市集、陇原非遗市集三大主题市集,还设置思书院旧址打卡点,唤醒读者对甘肃最早书院的城市记忆;乌镇阅读节则将水乡氛围与数字基因巧妙融合,让诗意水乡变为流动的图书馆。

探展记

做客衡王府,历史若比邻

为“诸王之范”

历史的真实,往往是多面的。存世一百多年里,衡王家族与青州社会名流、宦官世家、平民百姓往来频繁。这些宗室贵族,并不像刻板印象中那样“不堪”。衡王府历史文化展的主题定为“有邻”,这反映出今人对明代王府文化的重新思考,也体现了青州人对衡王府的更真实态度。

两则民间故事值得玩味。一则关于云门山寿字石刻。此处青州著名地标,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由衡王府内掌司周全所题。字高7.5米,宽3.7米,有“人无寸高”“寿比南山”的说法。关于其来历,有个“雪裹献寿戏衡王”的传说。

相传,衡王朱厚熜寿辰时发出告示,送寿礼最珍贵者,可坐寿宴首座。临近中午,穿道士雪裹径直走向首座,安然而坐。大家纷纷问他献了什么宝物,雪裹挥手指向南方说:“祝衡王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众人随之望去,只见一发光的大寿字出现在南边的云门山上。仔细端详,“寸”中缺了一点。衡王请求再三,雪裹用绸团蘸墨,信手抛去,正好补上了那一点。



饭后,大家上山观寿字,却发现金光是在因贴的麦秸皮反射阳光而成,不过是障眼法。衡王方知被戏弄,又舍不得寿字消失,便真的找来石匠将寿字刻出。

另一则关于女杰林四娘。相传,林四娘貌美如花,歌声动听,武艺不凡。其父林樵遭陷害被斩,四娘沦为歌女。衡王朱常澹游秦淮,遇四娘,为其赎身,并纳为妃。四娘统领所有姬妾侍女习武,练成一支娘子军,《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有诗云,“恒(衡)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习骑射。秋歌艳舞不成欢,列阵挽戈为自得”,说的就是这典故。

明崇祯初年,陕西王自用率起义军进攻青州,围困衡王府,府中兵勇无人敢破阵救主。四娘暴怒斥道:“养兵千日,徒费粮米矣!”随即披挂上阵,率娘子军出击,所向披靡。趁四娘酣战之际,兵勇将衡王救出。四娘竭力吐血阵亡,被人们誉为“婉婉将军”。衡王悲伤不已,葬四娘于后花园,晨昏祭奠。

民间故事未必可信,但从中可以看出,在青州民众印象中,衡王并非高冷孤傲,鱼肉乡里的暴徒。

明代宗室曾被视作“无用之人”,风花雪月,游手好闲。但不得不说,崇尚文化的他们,一定程度上成为明代宫廷与民间、本土与域外文化沟通的桥梁,在地方文化生态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一个有趣现象是,明代藩王在植物学、炼金术、地学、物理学、文化艺术领域都留下过不凡贡献。

明嘉靖《青州府志》记载,朱祐樾天资明颖,神采庄重,知书达礼,除了祭祀宗庙、朝拜天子之外,平日暇居斋宫,手不释卷,潜心研究琴棋书画。他还乐善好施,社会名声好,为“诸王之范”。

此后,高唐王朱厚熜、商河王朱载堉皆好古,工篆书,有名笔之誉;新乐王朱载堉聪颖好学,诗书画兼通。《便于搜检》《新乐王甲戌稿》《事亲述见》等十多种著作,都与衡王有关。若说衡王诗书传家,应不为过。

衡王一脉最重要的文化成就,还在琴学。他们不但擅长弹琴,编写琴谱,还监制古琴,著有《琴谱》《瑟谱》,推动了青州乃至山东琴学的发展。在展览的“相与为知音”单元,就有关于古琴的场景化展陈设计。

叩开“邻家”门

衡王府辉煌不再,但早已深深嵌入青州城市肌理,活在青州人记忆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邻居”。它承载着古城厚重的历史,见证了悠悠岁月,如同一位烟火老邻居,时有人想起,常常有人到访。



走进展厅,处处可见明中晚期风格的建筑彩绘,以及相关元素场景。无论是大铜钟,还是石龙头,都勾勒出王府曾经的壮丽。而科技的加持,则让衡王府变得更加可感可触。

借助高精度三维建模与艺术渲染技术,展厅将衡王府遗址东界,即今偶园街的生活图卷铺陈开来。

青州古城的标志性景观偶园,曾是衡王府东花园。月亮门旁的八角窗,内嵌显示屏,站在这里,观众好像是到衡王府里,看今日窗外的青州古街。从阜财门,到七大牌坊,再到万年桥、长街,尽收眼底。这是一场“古今同框”的时空对话,也拉近了青州博物馆、青州古城的物理间隔。

博物馆的显像装置,承担着综合叙事与情感共鸣的双重功能,的确需要更多走心的设计。

在展厅一角,有一座按形制复原的王府戏台。舞台中间是大屏,播放着专题片《王府寻踪》。从王府修建、衡王世系,到有关古迹和故事传说,一部王府影像志,何尝不是一部鲜活的历史大戏?

展厅还有一面王府生活互动墙。互动墙用多点触控交互的方式,展示了不同时期衡王及家眷的生活场景。初代衡王朱祐樾吟诗,高唐王弹琴,新乐王与齐东王下棋,末代衡王朱由楨与八王妃及其年幼的女儿捉迷藏……观众仿佛穿越回明代,沉浸王府生活细节与雅致情调。

衡王档案互动检测终端,同样值得一提。满足公众的探究热情,是博物馆教育和科研职能的目标。该终端以衡王世系为目录索引,每点击一个名字,就能了解人物生平、相关文物及故事传说等信息。



明代藩王史料不多,整理衡王档案看似简单,却需要下许多“笨功夫”。据了解,除了《明史》《青州府志》《益都县图志》等历史文献,策展团队还搜集、整理、考证了许多与衡王有关的碑刻、地方文史资料及民间传说。可见,每一次策展,也是文博人提升学术能力、挖掘地方文化的大考。

一场“访邻”之旅,也是一场“访古”之旅。展览从衡王府大门开始,又从衡王府大门结束。望向这红墙绿瓦的大宅门,五百多年风云变幻,尽收眼底,令人唏嘘。

历史不是尘封的老古董,就在我们身边。“有邻”,何止衡王府?

书展因何点燃大众热情

断货的狂欢为何能点燃大众热情?提供交流场。一场书展,不仅是人与书的相遇,还是人与人的相遇。南国书香节汇集了格非、梁晓声、戴建业、康震等200余位海内外名家;上海书展马伯庸新书分享会开始前,800个号码牌早已发完。知名作家的到来,不仅为书展带来了人气,更提升了思想对话的深度和影响力。与单向接收文本相比,读者更渴望与作者面对面交流。见面会一座难求,签售会排起长龙,都折射出人们对精神偶像的情感认同和对深度内容的热切追寻。

强化特色性。不同城市赋予书展独特的气质,它们成为城市文化脉搏的真实跳动。江苏书展以《姑苏繁华图》长卷为蓝本,串联起近60位苏州文学代表人物;兰州书展打造了丝路文化市集、黄河文化市集、陇原非遗市集三大主题市集,还设置思书院旧址打卡点,唤醒读者对甘肃最早书院的城市记忆;乌镇阅读节则将水乡氛围与数字基因巧妙融合,让诗意水乡变为流动的图书馆。

营造沉浸式。互联网解决交易的效率,而线下书展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其提供的沉浸式文化在场感。在这里,读者不仅可以买到书,更可以“进入书的世界”。

今年的香港书展第一次设置“文化及创意产品区”,把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体验带到现场。在上海书展中,湖南岳麓书社首次公开演出了参照马王堆汉墓出土服饰精心复原制作的汉服,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汉代服饰文化体验。去年在济南举办的书博会,更是通过元宇宙绘制了一个“天空书城”。这些创新体验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书是活的”,文化是可触摸、可参与、可共鸣的。

多年来,遍地开花的书展虽规模不同,方式不一,却共同构建起阅读活动的多元生态。从早期借助互联网推出线上书城,到拥抱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荐书,再到如今引入AI推荐书单,它们不断重塑人和书的相遇路径,让阅读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生活。优秀的书展,应当具有超越当下的时代感。不能仅限于年复一年的展销重复,而应通过丰

富多样的阅读活动主动回应时代议题。从对人工智能伦理的讨论,到对生态文明的关切,再到对地方文史的挖掘与重述,书展有能力成为引领公众思考重大议题的公共论坛。

书展还应打造独特的地域性,深度融入城市肌理。如上海书展联动乌镇,不断拓展书展的外延。南国书香节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将地域文化特色转化为独特的书展气质,使自身成为一张真正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名片”。

算法支配注意力的时代,书展的最终价值在于其“人的尺度”和“思想的温度”。书展除了为爱书人提供了一个与现实短暂脱离、进行深度精神交往的文化家园,更创造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场域,让人看到了阅读更多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好的书展,其标准不在于卖掉了多少本书,而在于它是否成功地激发了公众对阅读的久违热爱,是否促成了有意义的思想对话,是否让人们在合上书页之后,仍能感受到一种与更广阔世界相连的澎湃力量。

或许,这才是书展历经时代变迁而永不褪色的根本所在。

文物新发现

五古墩遗址:

见证明清胶东海防

□ 本报记者 鲍福玉

在威海文登区的滨海岬角上,五古墩遗址历经风雨洗礼,依旧矗立。这座被学界推测为明代靖海卫辖下烽墩的遗址,不仅是威海明清海防体系中重要的实物遗存,更将这片海岸早期倭患频仍的危机岁月、军民同心筑成威海的坚守精神,深深镌刻在胶东半岛的海岸线上,成为明清海防历史的见证者。

明朝建立后,倭寇多次侵扰山东,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朝廷早已意识到胶东半岛的海防重要性,洪武三十一年,朝廷设立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正式构建起胶东半岛早期的卫所防御体系。然而,新生的卫所体系尚未完全稳固,便迅速面临倭寇的直接冲击。永乐四年,倭寇首次大规模侵犯威海卫,烧杀抢掠后迅速撤离;仅仅两年后的永乐六年,倭寇又将矛头指向成山卫,同样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短短数年间,威海沿海从“相对安宁”沦为“倭患重灾区”,沿海百姓陷入“日夜惶恐”的困境。

“当时的倭寇侵扰具有鲜明的‘突发性’与‘破坏性’特征。”威海市文登区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费建文介绍,他们往往利用季风季节的有利条件,选择夜间乘小船偷偷登岸,凭借灵活的战术对沿海乡村与渔村展开劫掠,“焚掠边民、抢夺财物”后,在卫所军队赶来支援前迅速乘船逃离。虽然卫城凭借坚固的城墙与一定的兵力能够固守,但广大乡村与渔村缺乏有效的防御设施,成为倭寇劫掠的主要目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在这样“卫城难护全域,乡村屡遭劫掠”的严峻背景下,烽墩体系应运而生。作为卫所防御体系的“延伸触角”,烽墩的核心功能便是早期预警,通过在沿海关键位置设置瞭望点,及时发现倭寇动向并传递警报,为卫城驻军争取备战时间。

“据明代嘉靖《筹海图编》等史料记载,当时靖海卫下辖二十个墩,在沿海形成了严密的预警系统,我们根据现存遗址的地域范围,结合史料以及路径推测五古墩应为这其中之一。”费建文说,墩堡是用来传递军情的重要防御设施,也是最基本的防御单位,各卫、所、巡检司连同下辖的墩,堡组成一个小范围内的独立防御体系。每处墩堡相距5里或10里左右,作用是瞭望、警戒,并传递信息。

五古墩遗址的选址与布局,体现了明代烽墩建设的科学理念。它坐落于滨海岬角的坡地上,地势较高且三面环海,完全符合“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的建设标准。从地理位置上看,五古墩距距海岸120米、南距海岸170米、北距海岸140米,这一距离既能有效避免海浪对墩体的直接侵蚀,又能清晰监控近岸海域的每一处动向;而它与泽库墩遗址2.8千米的间距,也恰好处于明代“十里一墩”的规划范围内,确保了信号传递的及时性与准确性。这种精准的选址与布局绝非随意而为,密集的墩堡网络,构建起覆盖整个海岸线的“第一道防线”,将被动的防御转化为主动预警。

结合史料推测,五古墩顶部原本应有一个平台,平台上设有烟灶、旗杆、铜锣等预警设备,值守士兵在此日夜瞭望,一旦发现倭船踪迹,便按照“昼燃烟、夜举火”的规则传递警报。白天通过燃烧湿草产生浓密的烟雾,夜晚则点燃火把发出明亮的光芒,相邻的烽墩看到信号后迅速接力传递,短短数小时内便可将警报传递至卫城,为卫城驻军集结兵力,准备防御争取宝贵时间。

烽墩体系的建立对明朝防御倭患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永乐十七年,一场改变明代早期北方海防格局的战役,在辽东半岛的登沙河爆发。望海埚大捷不仅终结了明代早期倭患的猖獗态势,更让一水之隔的山东沿海防御压力骤减。战后,山东沿海从“频繁告警”转为“数年无倭患”,百姓终于过上安定的生活。

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重创了倭寇的有生力量,使其在短期内无力组织大规模跨海侵袭,更重要的是,望海埚大捷印证了烽墩网络在海防中的关键作用。大将刘江正是通过烽墩传递的准确情报,才得以从容布局、精准伏击,这让朝廷深刻认识到高效的烽墩体系是克敌制胜的“关键一环”。在这种战术思想指导下,战后朝廷迅速下令升级完善沿海各地烽墩体系,五古墩等烟墩烽墩的作用愈发凸显。

五古墩逃脱不了衰败的命运。随着北方沿海倭患逐渐减少,清雍正十三年,清政府对山东的海防进行调整,靖海卫被裁撤,其行政职能并入人文登县,其下辖的墩、堡等军事设施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到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传统烽墩在新式海军面前失去了防御价值,传统预警被电报、电话等方式取代,此时的五古墩也逐渐荒废,最终被遗忘在滨海岬角,成为渔民眼中一处普通的“土堆”。

尽管已经没落,以五古墩遗址为代表的烟墩烽墩遗址的内在价值却从未褪色。作为威海地区保存相对完整的明清海防遗址,五古墩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海防体系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费建文说,明初在山东沿海设置了卫、千户所、百户所、巡检司以及下辖的墩、堡、军屯,后期又设立了海防营、备倭司、寨/屯、炮台,这些都是以国家名义修建的用于抵御外敌的军事设施,为巩固明清两代的海防起到了关键作用。五古墩遗址的发现,丰富了威海地区烽墩考古的实物佐证,为研究明清两代海防理念、卫所制度、军事工艺提供了重要案例。

五古墩已不再承担海防功能,它如同一位沉默的耆老,见证着这里数百年历史变迁,也守护着胶东半岛抗击倭寇、抵御外侮的海防记忆。未来,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文化传承方式的创新,五古墩这处海防遗址的故事,也将被更多人知晓。

